联邦特工王

——埃德加·胡佛

点评：

埃德加·胡佛原是国会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后来业余读法律，并成为司法部的一名律师。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是让胡佛出人头地的是“林白幼子绑架案”。他破获此案后名声大振，从此把持联邦调查局48年之久，在这期间，政坛上先后更换了8个总统、10多个司法部长，只有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无人撼动，始终被胡佛占据着。

胡佛知道许多人、包括一些美国总统的秘密，而他更知道如何保守秘密，这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胡佛统治下的FBI就像一个禁区，连总统也打不进去。胡佛要求FBI的所有员工只效忠他一个人，只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美国总统面子还大。

胡佛身居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过着帝王般的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活，而联邦调查局就是他的王国。胡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

胡佛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也是知道“美国秘密”最多的人。那么，胡佛自己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快翻开本书瞧瞧吧！

关心国事狂热反共

约翰·埃德加·胡佛（1895－1972）出生时其父亲迪克森·胡佛已 38 岁，他们一家是移居华盛顿的。

埃德加的母亲安娜，她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在瑞士的克洛斯特斯（现在成为滑雪胜地）当过高级官吏。安妮的祖父移居美国，他曾担任瑞士第一任驻美国总领事。她的祖母生了 13 个子女，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在内战时期曾在国会山看护联邦军的伤员。

埃德加的父母是在埃德加出生 13 年以前结婚的，当时举行了“国会山附近最盛大的婚礼”。对安妮这个出身名门的女子来说，这乃是平常的事情，而对出身卑微的迪克森来说，这可非同小可。迪克森是政府制图部门的一个印刷工。

埃德加是他家 4 个子女中的最后一个。老大是男孩子，名叫小迪克森；接着是两个女儿，分别叫莉莲和萨迪。当母亲怀着埃德加的时候，萨迪不幸死于白喉症。

从埃德加幼年的照片看来，他是个阴郁的孩子，

总是偎依在父母的身边。 1901 年，他 6 岁时开始上学。那时，西奥多 ·罗斯福即将成为总统。埃德加从上学一开始，就是个明星学生。他在一年级的平均分数是 93. 8 从三年级到八年级，他的数学、代数、文法、语言、书法、阅读、历史等都是“优”或“良”。

1906 年，埃德加 11 岁的时候，他开始办自己的报纸。他每周收集两页的材料，说服他的哥哥帮他打印出来。他的报纸叫《每周评论》，以一分钱一份的价格卖给家人和亲友。

《每周评论》除家庭的短论外，还有关于亚伯拉罕 ·林肯和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消息。早期的一则头版消息报道了总统的女儿艾丽斯 · 罗斯福和众议院议长喜结良缘。

1908 年，埃德加 13 岁的时候，他开始记日记。他把每天的温度、天气变化、家庭成员的出生和死亡、他打零工的收入，甚至他的帽子、袜子、衣领的尺寸全都记录下来。

埃德加的父母都不怎么虔信宗教。迪克森认为自己是个路德教徒，而安妮则是个天主教徒。这些不同的教派引起思想混乱。埃德加的姐姐莉莲一气之下，曾把家里的圣经扔进火里。埃德加 13 岁时接受洗礼，参加了路德教会。

1909 年秋季，埃德加开始上新的学校，早上走 3 英里上学，晚上走 3 英里回家。这是他走向名利和权势的第一步。他上的是中区中学，它是培养华盛顿精英的温床，是走向成功的跳板。这个学校不仅重视学业，也很强调体育。埃德加学习之余，投入了学校的其他活动——学生军训队。中区中学定期送学生到西点军校接受培训。

埃德加在学校得了个外号，叫“快捷”。有人说，这是指他在踢足球时快速敏捷。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弗朗西斯·格雷在 1988 年回忆说，“我们之所以叫他‘快捷胡佛’，是因为他说话快，思维也快。”有人说，他说话像“机关枪”似的。有一位采访法院的记者说，“我 1 分钟可以记 200 个字，但那家伙（埃德加）1 分钟大概说 400 个字。”

埃德加在青少年时代就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中学辩论协会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在辩论备忘录中，有一条关于应当废除死刑的建议，他在旁边作出否定的答复。他的理由是：

1. 圣经主张有死刑。

2. 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有死刑。

3. 取消死刑，会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埃德加终生都主张保持死刑。

在辩论协会中有一次辩论妇女权利问题，具体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就是：是否应当给妇女以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埃德加持反对态度，结果他获胜了。

埃德加在中学继续保持好成绩，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上都是“优”等，平均分数为 90 分或 90分以上，4 年中只有 4 次旷课。

在学生军训中，埃德加担任一个学生连的连长。他的连在训练比赛中未能获胜，他十分伤心，他不能容忍屈居人下。

1913 年 3 月，埃德加连长率领他的学生连参加了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游行。共和党执政 16 年后下台了，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动荡时期。革命和战争席卷俄国和欧洲，而在美国，劳资纠纷也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近半数工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加班加点工作，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贫民窟家里。美国即将爆发罢工浪潮。美国有 100 万名社会主义者要求推翻资本主义。

在此期间，中区中学平静如常。 18 岁的埃德加和他的同学们忙于毕业年的种种纪念活动。埃德加·胡佛、弗朗西斯·格雷等同学穿着蓝白色的制服，仪表堂堂地去开罗饭店参加舞会。

“我们不大会跳舞，”格雷回忆说，“我们全都挎着马刀，它们很碍事。”那时候的舞会是非常正规的社交活动。每个年轻男子都带有一本舞册，要把女舞

伴的名字和她的陪伴人的名字记在上面。埃德加的舞册表明，他的陪伴人是他的父母。他没有跟任何女子跳舞。

埃德加的男朋友嘲笑他说，“他没有任何女朋友。他只爱军训队。”埃德加在军训队的最后报告中写道，“再没有比同军训队的军官和男同学在一起更快活的事情了，大家心连心，亲如手足。我觉得最令人伤心的是，不得不与已经成为我生活一部分的伙伴们分手。”

埃德加长大成人，要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了。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幸：他父亲迪克森精神失常了。医生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病情也未见好转。他患的是忧郁症，于 1921 年去世。

埃德加的哥哥、姐姐都已结婚，离开家。只剩下他和他的母亲安妮相依为命。当安妮于 1938 年离开人世时，埃德加另找了一个寓所，独自一人住在那里。

1913年埃德加从中央高中毕业。根据家庭与社区的情况，似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是他的既定目标。他首先希望学习法律，但更好的方法是先工作。于是他像哥哥一样，选择了进乔治·华盛顿大学夜校学习的途径。他在国会图书馆找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年薪 360 美元。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半的时间。

在学习法律的同时，他参加了“法律服务协会”的工作，得到一些法律方面的实际经验。三年学完本科后，又学了一年，在 1917年 6 月得到硕士学位。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国会递交了参战声明， 21—23 岁的男性有征兵义务。埃德加正值22 岁，身体健康，于是他一边通过律师考试，等待学位证书，一边填写了参战志愿表。此时，他 60 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不能工作，家里一年减少了 2000美元的收入，埃德加承担起养家及为父亲治病的重担，因哥哥迪克要养活妻子及三个孩子。 7 月，埃德加通过律师考试，得到在哥伦比亚特区高级法院工作的资格。

1917年 7 月 26 日，埃德加进入司法部作了档案处的抄写员，年薪 990 美元。一年后被提升为职员，年薪 1800 美元。对在司法部寻找机遇的埃德加来说，家庭是个难得的可靠支柱。埃德加的舅舅威廉·希茨曾任司法部长的特别助理，而且和战时紧急情况司的司长约翰·洛德·奥布赖恩是好友，并对奥布赖恩进入首都司法界有引荐之功。因此，除非有人推荐，否则像埃德加这样最低一级的职员，可能得到司法部高层领导的注意，有如此之快的晋升。

战时紧急情况司下设四个局。埃德加进入司法部的四个月后，奥布赖恩的一封信里首次提到埃德加，

说他在敌侨局工作，他可能在这之前就到了敌侨局。埃德加的工作是协助监视德国侨民，编制德国侨民表；为领导摘写案情简报、情况动态，并向领导递送。到 1918 年夏季，奥布赖恩签名的许多信件已是由埃德加起草的了。除此之外，他还为上司对案件从法律观点上作出评价，提出处理意见，并且参与处理敌侨局的棘手案件。这说明他已登上司法部的官员阶梯。

在 1919 年和 1920年，当埃德加·胡佛开始进行反对激进主义的战斗时，世界革命看起来不仅有发生的可能性，而且正在日益迫近。在那些年，埃德加反共立场从未动摇过。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话来说：“列宁还活着，西雅图大罢工似乎是涨潮的开始而不是退潮的开始”。

当时，埃德加在“敌侨局”的任期快要结束，他正最后处理那些毫无意义的案件。而在此同时，整个欧洲“似乎正在转向列宁的旗帜。1918 年 10 月，在匈牙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爆发了革命。一个月后，德国也发生了革命。德国革命废黜了皇帝，几乎消灭了容克贵族。在匈牙利、芬兰及德国部分地区，苏维埃宣布成立。尽管这一切很快就演变成流血和失败，但是人们却认为，这些国家中叛乱的势头并没有衰竭：在法国，军队受兵变折磨；在意大利，许多大城

市的工人夺取了工厂；在英国，一个激进的工厂工人代表运动正方兴未艾”。

1919年年初，埃德加和举国上下其他的人都蒙受到一阵铺天盖地而来的歇斯底里警告。这些警告是从讲坛、演讲会和报纸社论专版中发出的，称美国的政府制度和财产正受到国际革命的攻击，而美国的激进运动就是实现赤色分子阴谋的急先锋。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当红色浪潮在欧洲达到顶峰时，埃德加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还未形成任何独立的观点，所以他和社会上别的人一样，不得不依靠极端反共的报刊的报道。但在几个月后，身为司法部反激进活动处的头头，他就能够搜集和研究激进运动的全部出版物。对埃德加来说，这种资料似乎就是右翼报刊和保守政客们为之备感恐惧的权威性证据了。

1919年夏季，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其历史上最有生气和自信的时期时，埃德加深入研究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在担任反激进处处长最初几个月的忙乱日子里，他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工作。他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宣言和宣传品中剪贴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材料，他对共产党人的本质和意图有了深刻认识，从而使他在有生之年一直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

埃德加要办的头一件事是组建反激进处（1920年埃德加把该处改名为“综合情报处”），这主要是个

研究机构。埃德加在 1924 年被任命为调查局局长之前一直任该处处长。埃德加喜欢从事研究工作，早在国会图书馆和敌侨局工作时，就喜欢干这种工作。从一开始，埃德加作为司法部长特别助理，其薪金表明他是调查局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局长弗林和助理局长伯克。但不到一年，他就能每年挣 4500 美元，头衔虽不变但薪金却超过了助理局长（助理局长一年仍为 4000 美元）。就薪金而言，他实际是局里的二把手。

埃德加凭着他搜集的档案资料，正准备以政府反激进问题专家的身份大显身手。因为他的分析比任何对手都更加明确，更令人信服。反激进处的设施使埃德加对资料具有半垄断性。这种资料来之不易，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旁人难以接近，因此几乎不可能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独立研究分析。于是他使自己处于和在中央高中辩论时同样的地位，能够震慑和压倒敌手，而他进行的认真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对于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埃德加在组建反激进处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技巧使他成了政府关于共产主义的头号权威。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努力捍卫这一地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到了司法部不久，埃德加便被提升为特别法官，年薪为 2000 美元，这大大缓解了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

曾经帮助埃德加走向权势道路的奥布赖恩活到 98 岁高龄，比埃德加还多活了几个月。在他去世以前，有人问他，在促成那个名叫埃德加·胡佛的年轻人的事业方面，他起了什么作用时，这位老人承认：

“这一点，我要在黑暗的角落里悄悄地说，这是我应当赎的罪过之一。”

当美国庆祝欧战的结束时，埃德加的前途还没有着落。战时应急处解散后，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他申请到移民局工作，遭到拒绝；他找他的上司奥布赖恩，要求把他转移到调查局，也未能如愿。不过，奥布赖恩把他介绍给已被提名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

帕尔默一被提名为司法部长，包括奥布赖恩在内的一批高级官员就离开调查局。战争期间，帕尔默担任侨民财产管理局局长，被没收的千百万美元的德侨

财产落入民主党的亲信手中。帕尔默野心勃勃，志在总统，司法部只不过是他的一块跳板而已。正当他窥测时机之际，一场政治风暴来临了，这就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歇斯底里浪潮。

帕尔默 1919 年春季走马上任。那时，列宁正在号召世界革命。欧洲社会主义大动荡的可怕消息使美国中产阶级惊魂未定，他们又被美国国内此伏彼起的罢工烽火所震撼。仅仅是那一年，罢工就有 3000 多起。接踵而来的是炸弹袭击事件，连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的寓所也在半夜遭到袭击。参议院要求调查传说中的推翻政府的阴谋计划。国会提供经费，开展了对激进团体的全面调查。

对赤色分子的大调查开始了。帕尔默雇佣了前特工处处长威廉·弗林担任调查局局长，特工处俄国问题专家弗兰克·伯克为副局长。当他为司法部物色几名助理时，想起了埃德加·胡佛。在战时的法律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人要求留下来，埃德加是其中的一个。

特工处对埃德加进行了调查，发现他除了父亲重病，住进精神病院，由他负担费用之外，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24 岁的埃德加当了帕尔默的特别助理，领导一个新成立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是收集“革命的和极端激进的团体”的材料。

他的日常工作是由司法部助理部长弗朗西斯·加文指导的。加文是一个反颠覆的狂热分子，他对外国人有着本能的仇恨。埃德加很快就成为加文的“宠儿”。这个工作对他颇为合适，因为他过去曾经喜欢整理图书和记录他的衣物的尺寸，后来又在国会图书馆搞过编目工作。他现在可以利用他这方面的经验来编制左翼分子的资料索引卡片了。

他编写的索引卡片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是效率极高的，接近于今天的计算机检索。人名和相互参见条目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查到。埃德加的第一项庞大工作就是编制 50 万人的索引卡片。并编写了 6 万人的简历。

埃德加埋头于读共产党的文献和著作。他回忆说，“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第三国际的文献。”他向上级报告说，这些理论“威胁到社会的安全、个人的幸福……它们会破坏美国的和平生活。”

这对苏联共产主义作了准确的描写。然而，当时很少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有出现暴力革命的实际危险。不过，炸弹袭击事件使全国惊醒了，当然，帕尔默和他手下的年轻人的工作也起了作用。

埃德加的助理乔治·鲁赫是他中学时代的朋友，此人持有极右观点。他不同意让左翼分子像其他公民

那样发表反政府言论。他离开调查局后，到匹兹堡一家煤炭公司当工业警察的头头。埃德加派特工人员帮助他训练对付工人积极分子的打手。鲁赫对埃德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叫埃德加·胡佛。

他俩给上级提出了一个对付危险的激进分子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马萨诸塞州法官劳伦斯·布鲁克斯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插曲，比参议员麦卡锡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镇压行动有意识地选择在俄国革命两周年的1919年11月7日这一天开始。数以百计的革命嫌疑犯被逮捕，许多人遭到毒打。这些袭击是由警察局和调查局进行的，但是“处理”则是在司法部由埃德加掌握的。

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使埃德加第一次抛头露面。他向法院控告了埃玛·戈德曼，结果把她驱逐出境。看电影的人都知道，她是无政府主义者，她在电影《赤色分子》中批评了有组织的宗教，鼓吹了节制生育。她还宣传性解放、自由同居。埃德加说，搜查到的她的信件“读起来令人肉麻”。

早在埃德加出生以前，戈德曼就来到美国，她在美国居住了34年。她的父亲及其前夫都是美国人。但是，埃德加进行深入调查以后，说她丈夫的美国籍

是用欺骗手段弄到的； 18 年以前麦金莱遇刺身死，刺客是受了她讲话的煽动。

1919 年圣诞节的前 4 天，凌晨 2 时，埃德加和调查局局长弗林乘快艇赶到纽约港的埃利斯岛。他们目送戈德曼、她的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和其他 247 名被流放者登上军舰，把他们送往俄国。次日，埃德加美滋滋地向报界描述了他的这次经历。他说，“一俟必要，将把其他亲苏分子送往欧洲，从而把危险的激进分子清除出美国。”

新年元旦，埃德加也顾不上过自己的生日。最大的一次对赤色分子的袭击就要开始了。 1 月 2 日，警察局和调查局在 23 个城市逮捕了大约 1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证明是无辜的，予以释放。

司法部和帕尔默部长受到社会严厉的批评。对流放作出裁决的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波斯特说这个行动是“残酷的巨大骗局”。虽然埃德加自称“与此事无关”，但他和鲁赫显然是夜间袭击的主要指挥者。

调查局助理局长弗兰克·伯克下达的命令说，“在逮捕过程中，遇有重要事情，即与胡佛先生联系。”埃德加利用调查局的力量对那些代表被捕者、揭露侵犯人权行为的律师进行了侦察。目标之一是著名的哈佛法学院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他后来当了最高法院法官。埃德加监视弗兰克福特达半个世

纪之久，私下称他为“美国最危险的人物”。1961年，弗兰克福特到最高法院工作后，一份过去的报告成了埃德加的心头病。由“埃·胡佛”签署的1921年的这份报告说弗兰克福特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传播者”。事情败露后，埃德加为自己开脱，说这份报告是别人搞的。

不论是埃德加，还是司法部长帕尔默和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因对共产党的袭击而受到惩罚。国会的调查拖了很长时间，结果是新总统上台，换了司法部长，当事人不了了之。

埃德加取得了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首先，他知道了，进行全国性镇压，在美国是行得通的。尽管舆论大哗，对赤色分子的镇压毕竟使美国共产党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它的党员人数从袭击以前的8万人下降到1920年底的6000人。

埃德加还发现，可以不根据罪行，而根据政治信仰，对人们进行侦察和迫害。为了不被抓住，必须至少在法律上遵守“适当的程序”。一定不要让公众知道调查者的宝贵财富——秘密档案。在关于袭击赤色分子的听证会上，暴露了许多文件，造成被动局面。埃德加当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后，完善了档案制度，局外人是无法看到这些档案的，只有在对埃德加有利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档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